学术专论

《蒙古先祖世系源流》考论

关 康

[摘要]《蒙古先祖世系源流》是一篇完成于清末的满文蒙古编年简史，作者为被编入正蓝旗满洲旗分的乌鲁特部蒙古贵族后裔。这份编年史简要记载了蒙古始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元朝以及截至达延汗的历代大汗系年。作者在编纂时参考了汉文史料和一份北元时期的蒙古编年史，故该文献既沿袭了蒙古史学传统，又体现了汉文化的影响，显示出19世纪中后期一部分黄金家族成员独特的历史认知。

[关键词] 蒙古先祖世系源流 蒙古编年史 蒙古传统史学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3－0131－010

《蒙古先祖世系源流》(题目为笔者所拟，以下简称《世系》)，满文手抄本，无作者、年款，全文1800余字，是正蓝旗满洲吹尔札勒（满：coirjal）家谱的正文部分，与家谱图、张之洞撰《前署古城领队大臣升任哈密办事大臣保恒碑文》(以下简称《碑文》）合为一帙，现存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世系》可分为三部分：孛端察儿至也速该的先祖史；统一史，即元太祖征战简史；太宗至达延汗的历代大汗系年。《世系》所记内容与其他蒙古史籍出入颇多，史料来源亦较复杂，对于研究被编入八旗的蒙古贵族后裔的历史认知颇有价值。鉴于目前尚未引起学者注意，笔者将全文汉译，考证其作者、形成年代，并与其他蒙古史籍对勘，探究其史料来源及特色，以就正于方家。

一、《蒙古先祖世系源流》汉译

先祖史①

元太祖成吉思汗，姓博尔济吉忒奇渥温氏，名铁木真，龙飞斡难河。

元之始祖名孛端察儿，母阿阑豁阿，居北漠②时，明光屡照其腹，遂诞三子，长名不忽合答吉，次名不合秃撒勒只，三名孛端察儿。孛端察儿性貌异常，端重寡言，家人俱谓之愚。母云：“此子非愚，子孙必大贵。”后果为蒙古始祖。

[孛端察儿]后裔大蕃，互不统属，随意离散。合答吉苗裔为三州、夏齐之部，复易姓札只剌，居乌桓北，与魏洛、乃蛮、九姓回纥、古城、和林接壤。至孛端察儿九世孙也速该，征塔

[收稿日期] 2023-02-14

[作者简介] 关康（1984—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kwankangkang@126.com

① 小标题为笔者所加，下同。

② “北漠”原文be mo，意义不明。

塔儿，擒酋长铁木真，还至迭里温盘陀山，生太祖，遂名之铁木真，以纪军功。

统一史

也速该殁，太祖尚幼，属部俱奔同族泰亦赤兀惕部。泰亦赤兀惕纠集七部三万众来犯。太祖与诃额仑太后分部民十三翼，大战于答兰版朱思。泰亦赤兀惕败走，太祖方稍安。时泰亦赤兀惕地广民众，而无法律，其属议云："铁木真解衣与人，易马与人，实我等主也。"因俱投顺。后泰亦赤兀惕衰，太祖功德日隆，各部咸慕义来归。

乃蛮酋长塔阳可汗嫉太祖，与鞑靼酋长阿剌忽失云："兹闻东方有称王者。日月可以并光，人间岂有二主？公能助我右肩，夺其弓箭否？"阿剌忽失以此言来告。太祖集众臣，议征乃蛮。咸谓春时马弱，应俟入秋。太祖弟斡赤斤云："应行之事必速决，奈何托词马瘦？"别勒古台亦云："乃蛮欲夺弓箭而慢我，彼既恃大国肆其妄言，我伺其无备而攻之，必克成功。"太祖嘉之，遂征乃蛮。塔阳可汗纠合各部来犯，兵力壮盛。太祖饬哈撒儿主中军，鏖战至夜，塔阳可汗败死。各部溃乱，宵遁填沟壑者无算。翌日余众俱降。

[太祖] 遂召各部酋长会于斡难河源，登大宝。元太祖，号苏图·博格达·大明·成吉思汗。长子察合台，次子拙赤，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又生薛禅公主，共子女五。太祖时，令长子察合台于回子地面称汗，次子拙赤领托克曼，三子窝阔台继位，幼子拖雷守户产游牧。[拖雷] 太祖时薨。

历代系年

太宗窝阔台，丁未年 [生]，四十二岁戊子年继位，[在位] 六年。

太宗窝阔台长子贵由，二十九岁癸巳年继位，[在位] 六月。

弟阔端，丙寅年 [生]，二十九岁甲午年继位，[在位] 十八年。

太祖幼子拖雷生四子，长子蒙哥，次子忽必烈，三子旭烈兀，四子阿里不哥。

长子蒙哥，丁卯年 [生]，四十六岁壬子年继位，[在位] 八年。

蒙哥汗弟忽必烈薛禅汗，乙亥年 [生]，四十六岁庚申年继位，五十岁甲子年至癸未年，建都城四，曰避暑上都开平库儿都城大都、过冬京城大都、阿尔泰山阴阿鲁兰察噶城大都，额儿朱朗唐城四大都。统大元，齐四道，化四国，服八荒，寰宇内外安堵。

忽必烈汗福晋察必生四子，长子朵儿只，次子忙哥剌，三子真金，四子那木罕，又有薛只干公主，共五子。忽必烈薛禅汗在位三十四年，八十岁时，三子真金有子甘麻剌、答剌麻八剌、完泽笃兄弟三人。汗云："完泽笃堪承大统"，即令于甲午年登基，忽必烈薛禅汗是年殡天。

完泽笃汗，己丑年 [生]，二十九岁 [登基]，[在位] 十五年。

答剌麻八剌之子曲律汗，辛巳年 [生]，二十八岁戊申年登基，[在位] 四年。

曲律汗弟普颜笃汗，乙酉年 [生]，二十八岁壬子年继位，[在位] 九年。

普颜笃汗子格根汗，壬卯年 [生]，十九岁辛酉年继位，[在位] 三年。

甘麻剌子也孙铁木儿汗，癸巳年 [生]，三十二岁甲子年继位，[在位] 五年。

曲律汗长子阿剌吉八汗，庚子年 [生]，三十岁己巳年继位，[在位] 四十日。

阿剌吉八汗弟和世球汗，乙巳年 [生]，二十五岁己巳年登基，[在位] 五十日。

普颜笃汗子札牙笃汗，甲午年 [生]，二十六岁己巳年登基，[在位] 四年。

和世球汗子懿璘质班汗，丙寅年 [生]，七岁壬申年登基，[在位] 一月。

札牙笃汗子妥欢帖木儿乌哈笃汗，戊午年 [生]，十六岁癸酉年登基，在位三十六年，五十一岁戊申年 [失国]。太祖成吉思汗登基后一百八十二年，尼堪洪武皇帝篡国。此后在位七代十五汗。妥欢帖木儿汗出京，出独石口，于克鲁伦河岸建巴拉思城而居。五十三岁庚戌年崩。

妥欢帖木儿汗子必里秃汗，戊寅年 [生]，三十四岁辛亥年登基，[在位] 八年。

必里秃汗弟兀思哈勒汗，壬午年 [生]，三十八岁己未年登基，[在位] 十年。

兀思哈勒汗生三子，长子昂客招力图，次子额勒伯克，三子哈儿忽出黑。

昂客招力图汗，己亥年 [生]，三十一岁己巳年登基，[在位] 四年。

昂客招力图汗弟额勒伯克尼古勒苏克齐汗，辛丑年[生]，三十三岁癸酉年登基。

额勒伯克尼古勒苏克齐汗子坤帖木儿，丁巳年[生]，二十四岁庚辰年登基,[在位]十三年。[①]

坤帖木儿汗弟完者帖木儿，己未年[生]，二十五岁癸未年登基，[在位]八年。

完者帖木儿汗子答里巴汗，己亥（为“乙亥”之误——译者注）年[生]，十七岁辛卯年登基，[在位]五年。

此间乌济根台吉之子额克德伊台吉掌管蒙古余部。[②] 额克德伊台吉，庚午年[生]，三十七岁丙午年登基，[在位]十三年。

其后，额勒伯克尼古勒苏克齐汗子阿彻伊台吉生三子,[③] 长子岱总台吉，次阿黑巴儿只台吉，三子满都鲁台吉。

岱总台吉，壬寅年[生]，十八岁己未年登基，[在位]十四年。

岱总汗子马儿苦儿吉思，丙寅年[生]，七岁登基，以乌珂图汗之名一统[蒙古]，[在位]八年。[④]

岱总汗子摩伦台吉，丁巳年[生]，十七岁癸酉年登基，[在位]三年。

阿彻伊台吉之子满都鲁汗，丙午年[生]，三十八岁癸未年登基，[在位]五年。

阿黑巴儿只济农之子哈尔固楚克生巴延蒙克孛罗忽济农，二十九岁戊子年登基，[在位]三年。

巴延蒙克汗子巴图蒙克达延汗七岁登基，平定大元全蒙古、四卫拉特，享升平七十四年，癸卯年八十岁殡天。

巴图蒙克达延汉生十一子

与满都海薛禅福晋生子：

图鲁博罗忒、乌鲁思博罗忒（孪生）

巴尔思博罗忒、阿尔思博罗忒（孪生）

鄂齐尔博罗忒、阿尔出博罗忒（孪生）

阿尔博罗忒、格根公主（孪生）

固始福晋生五巴三察、青台吉二子。

只迷思干福晋生格列博罗忒、格呼森扎二子。

二、《世系》的作者及编纂年代

《世系》不著撰人，无年款，作者和编纂年代只能依据家谱图和《碑文》推测。家谱图开列自吹尔札勒以下十一代世系。《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吹尔札勒姓博尔济吉特氏，“正蓝旗人，

---

① 坤帖木儿生于丁巳年（1377），庚辰年（1400）登基，在位三年，于壬午年（1402）驾崩。《世系》作“十三年”，如此则下一代大汗应于癸巳年登基，但后文记完者帖木儿癸未年登基，从庚辰年到癸未年只有三年，所以此处的“十三年”显然是“三年”之误。

② 根据上下文推算，自乙未至乙巳汗位空缺,《世系》漏掉一人。这一代大汗的名号有争议，一说为额薛古汗（蒙：esekü qaγan,《蒙古源流》)，一说为斡亦剌台汗（蒙：oyiratai qaγan,《蒙古黄史》《蒙古黄金史》《水晶珠》)。《蒙古黄史》《蒙古源流》记此人为瓦剌的乌格齐哈什哈之子,《金轮千辐》《恒河之流》则记为答里巴汗之子。《蒙古源流》记载此人乙未年登基，乙巳年驾崩，正好填补《世系》纪年空白，可知阙载的是额薛古汗或斡亦剌台汗。此外,《世系》的“乌济根台吉”（满：ūjigen taiji）和“额克德伊台吉”（满：ekdei taiji）不见于史书，但后者庚午年生，丙午继位，戊午被杀，与《蒙古源流》记载的下一代阿岱汗（蒙：atai qaɤan）一致，说明原文的 ekdei 为满文 adai 的形近之误。《蒙古源流》记载阿岱汗为成吉思汗弟、火儿慎部始祖斡赤斤（蒙：očigin eǰen）的后人，那么满文的 ūjigen 应即蒙古文的 otčigin 之误。《世系》所谓“之子”（满：i jui）应视作虚指。

③ “阿初伊台吉”,《世系》原文写作 acei taiji，但此时北元有阿寨台吉（蒙：aǰai tayiǰi）和阿岱汗，后者已见于上条。另外，史载阿寨台吉生岱总汗、阿黑巴儿只、满都鲁三子，故此处应为阿寨，满文的 acei 为 aǰai 之误。

④《世系》此处记载在位八年，但如果马儿苦儿吉思丙寅年出生，七岁壬申年登基，八年后的庚辰年驾崩，那么下文的摩伦汗就不可能在癸酉年继位了，可知这里的“[在位]八年”为“[享年]八岁”之误。

明安同族，世居兀鲁特地方，国初率部属来归”。[①] 据《恒河之流》等文献，达延汗之子格勒博罗忒生隆台吉，后代为乌鲁特部诺颜。[②] 可知吹尔札勒出自格列博罗忒一系。但两者之间世系不明，仅罗密的《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列举了隆台吉部分后人的姓名官职，但未交代世系。[③] 吹尔札勒归顺后金之事见于《满文原档》，天命七年（1622）广宁城破，“乌鲁特国明安、索诺穆、吹尔札勒、喀尔玛、昂坤、多尔济库鲁……十贝勒偕妻孥、男丁千名，由广宁逃来”，随后与清太祖结为亲家。[④] 入关后，该家族定居京城，拥有一个二等轻车都尉世爵和正蓝旗满洲第一参领第十三、十四两个世袭佐领。[⑤]

根据家谱图，吹尔札勒生达尔玛（满：darma）、巴朗（满：barang）、戴青（满：daicing）三子，达尔玛、戴青绝嗣，只有巴朗有后人。家谱图中有一人名为“保恒”（满：booheng）者系巴朗五世孙，即《碑文》中的署理古城领队大臣“保恒”。据《清穆宗实录》，保恒历任乌什办事大臣、乌鲁木齐领队大臣。同治二年（1863）五月，奉命前往古城署理领队大臣一职。[⑥] 三年十一月，古城的满城遭妥明部回民军围攻。四年二月，病殁，城旋破，妻张氏、乌苏氏等人遇难，幼子龄冈失踪。四月，谕照军营病故例祭葬，[⑦] 家谱收录的由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之洞撰写的碑文应完成于同治四年。[⑧] 碑文中“衍四卫拉特之贵族，气奋风云；读七大黄册之秘书，胸罗象纬”一句值得注意，前半句误将保恒家族归入卫拉特，满文本的 monggo i amba mukūn ci tucifi，意为“出自蒙古名门”，符合保恒家族身份。后半句的“黄册”一词应即蒙古语的 altan debter，该词原指元代国史，后泛指蒙古史书，对应的满文为 suduri bithe，泛指一切历史读物，表意远不如汉文明确。这句碑文意在说明保恒博览蒙古史乘。鉴于《世系》是一部蒙古编年史，因此在缺乏其他线索的情况下，笔者暂定此人为作者。

如果推测无误，《世系》无疑完稿于同治四年之前。但家谱图中保恒之名为墨书，子孙为朱笔，显然修谱时保恒已死。笔者据此认定，《世系》的底稿为保恒所作，身故之后，家族成员重新誊写作为家谱的正文部分，与家谱图《碑文》合为一秩。[⑨]

三、《世系》的史料来源

如果《世系》出自保恒之手，他在编纂时参考了哪些文献，所记内容都是否准确是需要考察的问题。

通读《世系》满文原文，可以发现先祖史、统一史中的部分人名地名未遵循清代习惯连写，且明显音译自汉文。如“也速该”（蒙：yisügei）写作 ye su gei，“乃蛮”（蒙：naiman）写作 nai man，“阿剌忽失”（蒙：alaqus）写作 a la hū sy，“和林”（蒙：qorum）写作 ho lin。相反，历代系年中大汗之名都译自蒙古语。另有一名两译者，如“斡赤斤”在统一史部分写作 wa c’y gin，大汗系年部分虽误写作 ūjigen，但系蒙古文 otčigin 形近之误。若《世系》由保恒本人创作，译

---

①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 66，辽沈书社，1989 年，第 719 页。

② 衮布扎布：《恒河之流》，包力源译，第 97 页。

③ 罗密：《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第 28 页。

④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2 册，沉香亭企业社，2006 年，第 448、536 页。

⑤ 《钦定八旗通志》卷 290，《世职表十三》，第 6065 页；卷 14，《旗分志十四》，第 240−241 页。

⑥ 《清穆宗实录》卷 68，同治二年五月己巳。

⑦ 《清穆宗实录》卷 135，同治四年四月庚午。

⑧ 张之洞于同治二年至五年任职编修，亦可证碑文撰于此时。见《清史列传》卷 64，中华书局，1987 年，第 5106 页。

⑨ 《世系》满文抄本字体工整，但有十余处错字，多为形近之误，如将 jalan 写成 jalin，belhehekū 写作 belkehekū。其他人名有误者，如将 mungke（蒙哥）写作 mungsi，dayan han（达延汗）写作 diyan han。可知誊抄者的满文水准较差，亦不谙历史，故错字频出。

名当不致如此混乱，故可认定《世系》是截取蒙、汉史籍拼凑而成的。

将《世系》与元至清中前期常见的蒙汉文蒙古史籍对照，可大体分析出其史料来源。首先，先祖史部分篇幅很短，只有孛端察儿诞生、元太祖得名两个故事。各种文献对后者的记载基本一致，无从判断来源。阿阑豁阿生孛端察儿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系神人所为，《蒙古秘史》载阿阑豁阿称："每夜，有个透明的黄色的[神]人，沿着房的天窗、门额透光而入，抚摸着我的腹部，那光透入我的腹中。"①《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皆主此说。② 二为《元史》记载："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③ 重要的汉文史书《圣武亲征录》未记此事。与前面的《世系》译文比对，保恒采纳的是第一种说法，当取自蒙古史书。

其次，统一史部分的两则故事明显取材于元明时期的汉文文献。其一是泰亦赤兀惕部（泰赤乌部）众因元太祖仁义投顺，此事仅见于《圣武亲征录》和《元史》，且三者行文基本一致。《世系》记："时泰亦赤兀惕地广民众，而无法律，其属议云：'铁木真解衣与人，易马与人，实我等主也。'因俱投顺。后泰亦赤兀惕衰，太祖功德日隆，各部咸慕义来归。"《圣武亲征录》记为："是时，泰赤乌部地广民众，而内无统纪……泰赤乌部众苦其长非法，相告曰：'太子（谓太祖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肥马，安民定国，必此人也。'因悉来归。"④《元史》载："当是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人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若朵朗吉、若札剌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⑤

其二是塔阳可汗（太阳可汗、太阳罕）言进攻元太祖，后者召开会议决定反击。《世系》曰：

> 乃蛮酋长塔阳可汗嫉太祖，与鞑靼酋长阿剌忽失云："兹闻东面有称王者。日月可以并光，人间岂有二主？公能助我右肩，夺其弓箭否？"阿剌忽失以此言来告。太祖集众臣，议征乃蛮。咸谓春时马弱，应俟入秋。太祖弟斡赤斤云："应行之事必速决，奈何托词马瘦？"别勒古台亦云："乃蛮欲夺弓箭而慢我，彼既恃大国肆其妄言，我伺其无备而攻之，必克成功。"

《圣武亲征录》载：

> 时乃蛮太阳可汗遣使月忽难谋于王孤部主阿剌忽思的乞火力曰："近闻东方有称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岂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夺其弧矢耶！"……春，大会于帖木垓川，议伐乃蛮。百官谋曰："今畜牧疲瘦，待秋高马肥而后可进。"上弟斡赤斤那颜曰："毋虑马瘦，我骑尚壮，今势已如此，其可缓乎？以吾料敌，必取之；苟战胜，使他日指此地尝擒太阳可汗，当图此名。然胜负在天，必当进矣。"上弟别里古台那颜亦曰："乃蛮欲夺王弧矢，若果为夺，则身将安之？彼恃国大马繁，恣为夸语。今我卒然入之，国虽大，必逃散于山林，马虽繁，必遗弃于原野。掩其不虞，夺之弓矢，岂难哉！"⑥

《元史》载：

> 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心忌帝能，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曰："吾闻东方有称帝者。天无二日，民岂有二王邪？君能益吾右翼，吾将夺其弧矢也。"……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群臣以方春马瘦，宜俟秋高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曰："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⑦

---

① 佚名：《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② 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色道尔吉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③ 宋濂：《元史》卷1，中华书局，1976年，第1页。

④ 佚名：《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中华书局，2020年，第24–30页。

⑤ 宋濂：《元史》卷1，第4页。

⑥ 佚名：《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第165–171页。

⑦ 宋濂：《元史》卷1，第12页。

比照三者，除《世系》《元史》以阿剌忽失（阿刺忽思）为鞑靼酋长，《圣武亲征录》记为汪古部首领外，其他内容基本一致。《蒙古秘史》最早记载此事，但记塔阳汗讲话为前后两次，[①]《圣武亲征录》做了简化，后出的《元史》沿袭《圣武亲征录》。以上两事，《黄史》《黄金史纲》等北元和清前中期蒙古文史书不载。可知保恒在撰写上述两个故事时参考了汉文史书。

《世系》的第三部分以大汗系年为主体，除缺少具体事件外，行文风格与北元至清朝蒙古学者编纂的史书非常相似。笔者将《世系》与其他蒙古文史书比对，发现《世系》所记自窝阔台至达延汗 29 代汗的生卒、登基年份，有 23 处与《蒙古源流》相同，其次为《蒙古黄史》21 处，《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金轮千辐》各 3 处，《蒙古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阿萨拉克其史》《恒河之流》各 2 处，《元史》《水晶珠》各 1 处。可见《世系》的大汗系年部分与《蒙古源流》《蒙古黄史》相似之处远多于其他史书。

《世系》《蒙古源流》《蒙古黄史》三种文献对事件的记录也有雷同之处。《世系》记载忽必烈生前钦定继承人之事如下：

> 忽必烈汗福晋察必生四子，长子朵儿只，次子忙哥剌，三子真金，四子那木罕，又有薛只干公主，共五子……三子真金有子甘麻喇、答剌麻八剌、完泽笃兄弟三人。汗云："完泽笃堪承大统"，即令于甲午年登基，忽必烈薛禅汗是年殡天。

《蒙古黄史》载：

> 恰克剌瓦尔迪汗之察必哈屯生朵儿只、忙哥剌、真金、那木罕，共四子。真金太子之子甘麻剌、答剌嘛八剌、完泽笃三人。祖父谓曰："可令完泽笃执政。"[②]

《蒙古源流》载：

> 斫迦罗伐剌底薛禅皇帝的美丽的察必皇后生了朵儿只、忙哥剌、真金、那木罕四个儿子和名叫薛只干的一个独生女儿……[忽必烈]以"我已经降过圣旨"[为信]，在审视了真金太子的三个儿子甘麻剌、达剌麻八喇和完泽笃三人之后，[降旨]说："这个完泽笃能执掌政权。"[③]

《蒙古黄史》是萨冈彻辰撰写《蒙古源流》时重要的参考书籍，所以如果《世系》与《蒙古源流》相同之处多，则必然与《蒙古黄史》多有重合。需要注意的是，有三处记载仅见于《世系》和《蒙古源流》。第一处是元明宗和世㻋的系年。和世㻋生于庚子年（1300），己巳年（1329）正月在漠北草原登基，当年八月暴崩。《金轮千辐》记巳年四月登基，八月驾崩。[④]《蒙古黄史》记二十五岁继位，在位一个月。[⑤]《阿萨拉克其史》记在位四个月。[⑥]《蒙古源流》与《世系》都记载生于乙巳年，己巳年二十五岁登基，在位五十天。[⑦]

第二处为成吉思汗分封四子，《世系》称："长子察合台，次子拙赤，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又生薛禅公主，共子女五。太祖时，令长子察合台于回子地面称汗，次子拙赤领托克曼，三子窝阔台继位，幼子拖雷守户产游牧。"《蒙古源流》记为："主上在世时，长子察合台阿哈在撒儿塔兀勒作了罕。次子叫做术赤，在托克马克作了罕。三子窝阔台守了合罕位。幼子拖雷守着火灶。"[⑧]

《蒙古源流》所谓"托克马克"即古代的碎叶城，属察合台汗国，而非拙赤封国。《世系》在将"托克马克"的蒙古文 toγmaγ 转写成满文时误作 tookman。除了将"撒儿塔兀勒"改为清代通用的"回子地面"（满：hūisei ba）外，《世系》与《蒙古源流》无异。其他蒙古史书多有类似记载，但

① 佚名：《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注，第 287–290 页。

② 佚名：《蒙古黄史》，乌力吉图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0 页。

③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34–235 页。

④ 答理麻固什：《金轮千幅》，乔吉注，包额尔德穆图、海英编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94 页。

⑤ 佚名：《蒙古黄史》，乌力吉图译，第 10 页。

⑥ 乌云毕力格：《〈阿萨拉克其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04 页。

⑦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35 页。

⑧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31 页。

通常以术赤为长子，察合台为次子。① 乌兰认为：“窝阔台即汗位后，汗国大事必先征求察合台的意见，因窝阔台尊称他为阿哈（兄），以后历代大汗也就随之称其继承人为察合台阿哈……《蒙古源流》作者因此误以为察合台是长子”。② 无论错误原因何在，都足证《世系》与《蒙古源流》的关系。

第三处记元世祖建立四座都城一事，此事不见于其他史书，《世系》《蒙古源流》的行文如出一辙。《世系》记为：“五十岁甲子年至癸未年，建都城四，曰避暑上都开平库儿都城大都、过冬京城大都、阿尔泰山阴阿鲁兰察噶城大都、额儿朱朗唐城四大都。”《蒙古源流》记为：“[他]在从五十岁的甲子年至辛未年的八年之间，修建了夏宫上都开平库儿都城、冬宫大都城、按台山山阴阿喇勒[地方]的察罕城、额儿出吉[地方]的凉亭城等四座宏伟的都城。”③

《蒙古源流》与《世系》也有很多分歧。第一，《蒙古源流》记事下限至清朝，但《世系》中达延汗之后的阿拉克汗至林丹汗全部阙载。第二，个别大汗生卒年不同。如《世系》记世祖忽必烈乙亥年生，庚申年继位，甲午年去世，而《蒙古源流》记庚申年驾崩。④《世系》记成宗完泽笃汗己丑年生，二十九岁登基，在位十五年，《蒙古源流》记生于乙丑年，甲午年继位，在位十一年，丁未年驾崩。⑤《世系》中武宗海山辛巳年生，二十八岁戊申年登基，在位四年，《蒙古源流》记戊寅年登基。⑥《世系》记摩伦汗丁巳年生，十七岁癸酉年登基，在位三年，乙亥年驾崩，《蒙古源流》记甲戌年驾崩。⑦ 第三，上文列举的《世系》取自汉文史书的内容不见于《蒙古源流》。⑧

由以上区别可知，《世系》并不是《蒙古源流》的缩编版，二者多处雷同，说明保恒利用的是一份与《蒙古源流》接近的文献。这份文献作者无考，但《世系》留下了一条线索显示其形成年代非常早。《世系》在记述惠宗失国时有“太祖成吉思汗登基后一百八十二年，尼堪洪武皇帝篡国，此后在位七代十五汗”（满：taidzu cinggis han i soorin de tehe ci ebsi emu tanggū jakūnju juwe aniya, nikan i hūng u han doro be durihe, ereci han i soorin de tehe han tofohon nadan jalan）一句。原文的“此后”（满：ereci）显示这句话是指“尼堪洪武皇帝篡国”之后而言，《世系》中自昭宗至最后一代达延汗为 7 代 14 汗，加上被遗漏的额薛古汗（或斡亦剌台汗）正好 15 汗，⑨ 可知此处指北元而言，换句话说，在作者的认知中北元只有 15 位大汗，说明他撰写大汗世系时期恰好处于达延汗、阿拉克汗之间。这份形成于北元时期的文献很可能一直由吹尔札勒家族庋藏，至清末保恒据此编纂了《世系》的大汗系年。因为《世系》的系年部分与《蒙古黄史》《蒙古源流》接近，笔者推测这份文献或亦是这两种史书的史料来源之一。

此外，《世系》的个别记载不见于已知、习见的史书，如惠宗乌哈笃汗，戊午年生，十六岁癸酉年登基，在位三十六年，五十三岁庚戌年崩。《蒙古黄史》记生于壬午年，⑩《黄金史》记申年登基，戌年二十九岁驾崩。⑪《蒙古源流》记登基于己酉年。⑫ 另如先祖史部分提到合答吉后人

---

① 佚名：《蒙古黄史》，乌力吉图译，第 9 页；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色道尔吉译，第 380 页。

②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48 页。

③④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32 页。

⑤⑥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35 页。

⑦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79–281 页。

⑧ 因蒙古史书的干支纪年大多错误，难以确定所对应的公元纪年，除了部分能够确认的以外，其他干支纪年的公元年份，本文从略。

⑨《世系》的满文抄本错漏不少，不能排除 ereci 之后漏字的可能性。在满文中，以 ereci 开头表示时间先后的常见词有 ereci amasi、ereci julesi、ereci fusihūn 和 ereci wesihun。其中 ereci amasi、ereci julesi、ereci fusihūn 都表“之后”，与 ereci 同义，所以如果原文最初使用的是以上三个词组中的任意一个，出现漏字都不妨碍原义。如果原文是 ereci wesihun 即“以上”，那么这句话指的就是从太祖到惠宗，但按照《世系》的算法，实为 8 代 16 汗，所以原文应是 ereci，或与 ereci 一样表示“之后”的词。

⑩ 佚名：《蒙古黄史》，乌力吉图译，第 10 页。

⑪ 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色道尔吉译，第 277–283 页。

⑫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36 页。

成为三州、夏齐之部，“居乌桓北，与魏洛、乃蛮、九姓回纥、古城、和林接壤”。根据《蒙古秘史》，“不忽・合答吉 [的后裔]，成为合达斤氏”，札只剌氏是孛端察儿外姓之子，后代以札答阑（札只剌）为氏。[①] 作者把两人、两氏族混淆。至于“三州、夏齐”（满：san jeo, hiya ki）、“魏洛”（满：wei lo）之名，不见于史书，词义亦不可解，所列其他地名、民族名亦分属不同时代，特别是“古城”（满：gu ceng）之名仅见于清朝，故这些内容当为保恒所加。

既然《世系》基本上是由多种蒙汉文史书凑编而成的，故其内容是否可靠取决于所依据的材料。总体上看，先祖史、统一史部分引用的是比较可信的文献，但大汗系年部分，除世祖忽必烈、宁宗懿璘质班外全部错误。如谓宪宗蒙哥丁卯年生，四十六岁壬子年登基，在位八年，实应为戊辰年（1209）生，辛亥年（1251）登基，己未年（1259）驾崩。岱总汗壬寅年生，十八岁己未年登基，在位十四年，壬申年驾崩，实际上脱脱不花生年不详，壬子年（1432）由脱欢拥戴为汗，壬申年（1452）被害。达延汗七岁登基，在位七十四年，终年八十岁，但达延汗生于甲午年（1474），卒于丁丑年（1517），在世四十三年，《世系》说法与史实相去甚远。《世系》在纪事方面也有诸多错误，笔者举例如下。

《世系》谓元太祖在答兰版朱思分部众为十三翼，大破札木合联军。按照《蒙古秘史》记载，二人在答兰版朱思和阔亦田各交战一次，元太祖先负后胜。但后代史书除了《蒙古黄金史》，悉将两次作战合为一次，并讳言元太祖失利。《世系》以阔端为蒙古第四代大汗，此说见于《蒙古黄史》《阿萨拉克其史》《金轮千辐》《蒙古源流》，[②] 但历史上阔端从未称汗。《世系》以阿剌吉八为海山之子，此说与《蒙古黄史》《蒙古源流》一致，[③] 实际上应为泰定帝也孙帖木儿之子。《世系》记载北元第三代汗为昂克招力图汗，这一说法也见于其他多种蒙古文史书，但招力图汗为阿里不哥后人也速迭儿，此人杀死兀思哈勒汗自立，昂克汗为其子，后代蒙古史书多误将父子二人合为一代大汗。《世系》记巴彦蒙克孛罗忽济农戊子年登基，在位三年，但此人未称汗，但除《阿萨拉克其史》《蒙古黄金史》外，多数蒙古文史书都将其列入正统大汗序列。如《蒙古源流》提到：“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戊子年二十九岁，三年之后，于庚寅年被应绍卜人客哩礼、察罕、帖木儿、猛可、哈喇・巴歹五人杀害，享年三十一岁”，[④] 所记年份与《世系》一致。《蒙古源流》蒙古文原文前半句为“tedüi bayan möngke bolqu ǰinong qorin yisün-iye nu uquluγuna ǰil-eče γurban od boluγad”，乌兰认为此为“蒙文史书中表示汗和吉囊在位年数的习惯用法”。[⑤]《世系》满文原文使用“soorin de tehe”（登基）一词，显然保恒也误以此人为汗。

四、《世系》的特点

经与其他文献比对可知，《世系》取材于《圣武新征录》《元史》汉文史书和一份北元编年史，另有少量独创内容，但错漏百出，不足用以考订史事，不过若将其置于古代蒙古史学发展历程中，则可发现其独到之处。为便于讨论，笔者选择典型的蒙古史书《蒙古黄史》和受汉文化影响的蒙古学者所撰《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作为参照，总结《世系》的特色。

《蒙古黄史》（蒙：sir−a tuγuji），全名《古昔蒙古诸汗源流之大黄史》（蒙：erten−ü monγol−

① 佚名：《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注，第 28、30 页。

② 佚名：《蒙古黄史》，乌力吉图译，第 9 页；乌云毕力格：《〈阿萨拉克其史〉研究》，第 101 页；答理麻固什：《金轮千幅》，乔吉注，包额尔德穆图、海英编译，第 81 页；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31 页。

③ 佚名：《蒙古黄史》，乌力吉图译，第 10 页；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36 页。

④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283 页。

⑤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 346 页。

un qad-un ündüsün-ü yeke sir-a tuγuji），成书于 17 世纪上半叶，此时蒙古民族已经接受藏传佛教，知识精英热衷于将本民族的历史上溯至印度、西藏。在这种背景下，《蒙古黄史》中出现了印藏蒙同源说：印度的大三末多王后裔因出生时长相怪异被丢弃恒河，漂流至西藏，成为吐蕃的项椅王；项椅王后裔金椅王被大臣杀害，幼子孛儿帖赤那逃到蒙古草原，成为蒙古祖先。① 《蒙古黄史》还记录元朝历代皇帝供奉的喇嘛上师，如“普颜笃即位，供奉萨斯迦本钦锡里巴达喇嘛，在位九年，年三十六岁，申年逝世”。② 这种佛教史观对后世蒙古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蒙古黄史》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汗统，强调黄金家族，特别是忽必烈一系的正统地位。事实上，北元时期孛儿只斤旁支的阿里不哥后人一度夺取大位，古代东部蒙古学者讳言此事，将几位篡位大汗归入忽必烈系以证明汗统的纯洁性。

第二部可作为参照的史书《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有满蒙汉三种版本，满文版目前未见。作者罗密与保恒同为格勒博罗忒后人，是在京生活且熟悉多种语言的满洲旗人。该书沿袭了前代的印藏蒙同源说和以大汗世系为主体的草原史学传统，特别是北元部分与《蒙古黄史》等史书在风格、内容方面差异不大。然而罗密作为生活在内地、有条件接触汉文史书的蒙古人，又在著作中增加了很多草原学者不了解的史实，进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一是兼记元朝皇帝的蒙汉文庙号，《蒙古黄史》等只记大汗的蒙古尊号，忽略庙号。罗密则将两种合在一起，如“武宗库鲁克海山汗”“英宗格根汗”“顺帝掩欢忒睦尔乌哈哈图汗”等。其二，北元时期蒙古史书作者不懂汉文，无法利用《元史》等文献，所以在撰写元代历史时往往只有系年而缺少记事，罗密则依据汉文史书增加了南坡之变、两都之战、仁宗开科等元代重要历史事件。其三是从汉文化的角度评价元朝皇帝。如在介绍仁宗普颜笃汗生平大事后赞美其具有孝悌仁慈的美德：

> 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尝曰：“儒者可尚，以其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服御质素，不崇货利；侍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大臣，始终恩礼；每遇有司奏大辟，辄惨恻移时；至于灾异伤民，尤必加赈恤云。③

可以说，《蒙古黄史》代表的是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蒙古史学，《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在继承蒙藏佛教史观的同时加入了汉文化的成分。以两书为参照，可以发现保恒仍然沿袭蒙古传统史学重汗统、轻事实的习惯，在《世系》中杀害兀思哈勒汗的招力图汗也速迭儿、昂客汗父子被合并为昂客招力图汗，出身被篡改为兀思哈勒汗之子；坤帖木儿被改为额勒伯克汗之子；答里巴汗成为完者帖木儿汗之子。此外，《世系》除太祖、太宗外，统一使用蒙古尊号；元朝部分基本只有系年没有事件。上述写法与此前的蒙古文献没有区别。同时，《世系》摒弃了印藏蒙同源说，甚至没有提到孛儿帖赤那，而是恢复到《蒙古秘史》确立的以孛端察儿为黄金家族始祖的传统。④ 究其原因，神化孛端察儿是《蒙古秘史》以来的习惯，只不过北元和清代文献将其纳入佛教君主序列，保恒本人或受汉文化的影响，并未接受佛教史观，所以他对祖先溯源问题的处理与其他蒙古史书不同。另外，保恒从汉文史书中摘出泰亦赤兀惕衰落的故事插入统一史，强调元太祖因“解衣与人，易马与人”获得其他部落支持，显然意在证明元太祖在杀伐之外还有仁慈的一面，相比《蒙古黄史》，这种对君主美德的推崇显然更接近汉地史学传统。

如果说《蒙古黄史》《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分别是蒙藏、蒙藏汉文化融合的产物，那么保恒对祖先历史的认知无疑介于二者之间。他并未逾越传统的窠臼，仍然沿袭了蒙古史学重视汗统的习惯，但不采用宗教史观，又利用了汉文文献，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对君主的评价

---

① 佚名：《蒙古黄史》，乌力吉图译，第 2–3 页。

② 佚名：《蒙古黄史》，乌力吉图译，第 10 页。

③ 罗密：《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第 10–11 页。

④ 佚名：《蒙古秘史》，余大钧译注，第 30 页。

标准。可以说《世系》显示一部分被编入八旗、久居内地的蒙古人在清后期逐渐产生了一种蒙汉文化杂糅的历史认知。①

综上所述，保恒以一份不为今人熟悉的北元史籍为基础，参考汉文史书，用满文撰写了一份自孛端察儿至达延汗诸子的编年史。该编年史体现了蒙古传统史学在19世纪后期发生的变化。蒙古传统史学是典型的草原史学，特点是传说与史实不分，以贵族世系为主干，书面和口传史料并重，且以宗教史观作为理论基础。②13世纪的《蒙古秘史》即最原始的草原史籍。元朝沿袭了中原王朝的史官制度，沿袭汉地史学传统编纂了《实录》《圣武亲征录》等文献。后经过元明易代，明朝北伐以及内讧，文献损失惨重，汉文化的影响日趋减弱，重视汗统的草原史学复兴，③ 加上藏传佛教的影响，17世纪之后成书的《蒙古黄史》《蒙古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史书即蒙藏文化融合的产物。17世纪初，一些黄金家族成员被编入八旗，世居北京，有机会接触汉地史书。同时，《元史》等汉文史书流入蒙古地区，部分旗下和草原学者又将蒙藏和汉地史学杂糅，雍乾时期的《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水晶珠》即属此类。《世系》的作者保恒生活在清后期，既继承了重汗统的草原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史观，同时剔除了佛教的影响。清末的一部分旗下蒙古人虽然与生活在草原的蒙古人同属一个民族甚至家族，但制度和地域的区隔，加上周遭文化和个人信仰的差异，使他们在对祖先历史的认知上逐渐产生了分歧，进而形成了新的史观。

References

Bira, Sha. *Menggu shixueshi, shisanshiji zhi shiqishiji* (The historiography of Mongolia, 13–17th centur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5.

The Annot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Mongolian Lineage

GUAN Ka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wankangkang@126.com)

Abstract: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ian Ancestors” is a brief chronicle comple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ritten by the descendants of the Mongolian nobles of the Urut tribe who were included in the Manchu Pure Blue Banner. This chronicle briefly records the Mongolian ancestors, Genghis Khan’s unification of Mongolia,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Yuan Khan ancestral line up to Dayan Khan. Because the author refers to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 Mongolian chronicle of the Northern Yuan Dynasty, this compilationn not only follows the Mongolia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 showing the uniqu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some descendants of the “Golden Famil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 The Mongolian Lineage, Mongolian chronicle, Mongolia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

① 当然，汉文化对清末蒙古人史观的影响不应被夸大。如清末民初的蒙古学者罗卜藏全丹在《蒙古风俗鉴》中仍然坚持蒙古人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可见蒙古传统的佛教史观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见罗卜藏全丹：《蒙古风俗鉴》，那日萨译注，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年。

② 沙·比拉：《蒙古史学史（13世纪至17世纪）》，陈弘法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0页。

③ 一如沙·比拉所谓：“北元时期蒙古史学活动的基本形式是编写最显贵家族的世系史。正是这些世系史此后成了17世纪史学家们撰写15世纪至16世纪蒙古诸汗王公世系史的主要资料来源。”见沙·比拉：《蒙古史学史（13世纪至17世纪）》，陈弘法译，第135页。